

# 徐特立文存

主編：武 衡 談天民 戴永增

第一卷





国防大学 2 063 1828 8

# 徐特立文存

第一卷

武衡



李維武 衡 徐天民 戴永增  
顾同 徐 亮

广东教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徐特立文存

/ 武衡; 谈天民; 戴永增主编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5.12

ISBN 7—5406—3421—9

I. 徐…

II. 武…

III. 徐特立—教育思想—文集

IV. G40—0927

## 徐特立文存

### 第一卷

武衡 谈天民 戴永增 主编

\*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4印张 350000字

1995年12月第1版 1996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7—5406—3421—9

G·3253 定价 15.50元





八十高龄的徐特立



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四年  
在法国留学时的徐特立。



徐特立(前排右四)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与我国留学生合影。





徐特立一九二四年在  
广州芳草街留影。



徐特立与夫人熊立诚一八八九年结婚，  
七十多年白头偕老。



徐特立与夫人及家人合影。后排自左至右徐丹(外孙女)、  
吕勤昭(警卫员)、徐乾(儿媳、秘书)、徐陌青(次女)、徐守珍(三女)



一九三六年徐特立与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合影。





一九六一年于北戴河。





## 编者说明

徐特立是我国近代杰出的革命教育家，今年是他从事教育工作 100 周年纪念，“他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革命的一生，伟大的一生。”他曾任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大学——延安自然科学学院院长。今年是延安自然科学学院（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创建 55 周年，我们编辑了这套《徐特立文存》献给读者，同时供中外有志于研究徐特立教育思想及其生平的同行人和后人参阅、借鉴，并以此书寄托我们对徐老院长的怀念和向校庆献礼。

《徐特立文存》的编纂工作是从 1984 年开始的。经过三年收集资料，两年整理誊清，五年选编、校核、审订，从 400 多万字的资料中精选编纂成书。内容以有关教育的著述为主，同时选编了可供研究徐特立教育思想及其生平的部分笔记、读书日记、诗词、书信、随笔和少量附文，共 350 余篇。全书共分五卷，共约 180 余万字，其中约 60% 是未发表过的。

本书的编纂基本上是以时间为序。故凡属年代相近的文章、诗词、信函及所编教科书均相对集中编排。附文是为让读者了解正文背景而编入本书的，故一般均放在正文之后或卷末。唯因解放后的文字太多，故将这时期的文章、笔记、日记及徐老逝世后几篇回忆他、纪念他的重要文章（附文），分两卷编入本《文存》中。各卷的年代界限为：第一卷，1902—1937 年（本世纪初至抗战前



夕)；第二卷，1937年—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第三卷，1945年—1949年(解放战争时期)；第四、第五卷，1949年10月—1968年逝世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对收入本《文存》的各篇论著，一般都注明原载、出处和时间，但也有一些因已无法查考，所以并未能标明；对于文内涉及的古今中外的人名、地名、书报刊名及时间、地点，也一一进行了校核；对其中的引文及原注，均照原来不动；对已发表过的文章，凡经作者修改过的，均重新作了校订。

收入本《文存》的论著，尤其是未发表过的手稿、笔记、读书日记、书信、诗词、随笔、附文等，大部分为本书顾问徐乾同志提供。她对本书的编纂倾力相助，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具体的指导。

先后参加本书资料收集工作的有：吉多智、李国光、李邦起、常顺英、黄发荣、戴永增。其中吉多智、李国光为本书资料整理做了前期的物质与思想准备工作，并对后期的编纂工作提供了有益的意见。

参加本书资料整理、誊写工作的有戴永增、霍雅玲、王珂、李志峰、李邦起、常顺英、刘福琴、宋钺。

各卷编纂者为：第一卷：戴永增、王珂、杨东平；第二卷：戴永增、李志峰、李邦起；第三卷：戴永增、霍雅玲；第四卷：戴永增、杨东平；第五卷：戴永增、常顺英。

编审者：武衡、谈天民、戴永增、霍雅玲、杨东平、王珂、李志峰、李邦起、宋钺、常顺英、吉多智、李国光、赵和平。统稿及校核者为戴永增。最后由武衡、谈天民、戴永增审定全稿。

本书在编纂过程中，曾得到延安自然科学学院的老校友、老同志和北京理工大学的领导及高教研究所有关同志的关心和帮助；得到了湖南、陕西、广州三省市徐特立教育思想研究会和广东教

育出版社的支持和大力协助。在这里谨对以上单位和有关同志，以及一切关心、支持本文存编纂、出版的朋友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徐特立自 1895 年起从事教育事业长达 73 年，著述丰富，内容广泛，时间较长，又几经战乱，其文稿大多已遗失或已难于查考，所以资料收集十分困难，遗珠漏玉在所难免。更兼编者水平及时间所限，有误之处还望读者不吝赐教，预为致谢。

此外，《文存》中许多未曾发表过的文章，都是在战争环境中匆促写就的，更有一些漫谈或讲话，是由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随手记录下来的，收入本《文存》时，虽经梳理，但有些文章仍略嫌粗糙或不够规范。为了尊重历史，我们除了对其中的一些明显纰漏作出订正外，一般均不作改动。

一九九五年十月



# 推着历史车轮前进

## ——序《徐特立文存》

式 衡

《徐特立文存》所收集的文章从本世纪初到 60 年代，时间跨越半个多世纪，它反映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急速变更的时代精神，又直接地记述了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几十年来的发展历程。

徐特立同志（1877—1968）经历了清朝末年、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从事革命和教育事业凡七十三年。他早年曾先后到法国、苏联、日本、比利时、德国留学及考察教育，对古今中外教育有很深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他的部分著述已先后收入《徐特立教育文集》、《徐特立文集》、《徐特立读书眉批选》；他的教育思想系统地反映在《徐特立教育学》中。《徐特立文存》则较全面地收入了他的著作，其中大部分是未发表过的手稿及部分笔记、读书日记、诗词、书信及少量有关附文。它翔实地反映了徐老的革命活动、教育理论与实践及其师表风范，真实地展现了徐特立的改革创新精神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以及他对教育的卓识远见，为我们与后人学习、研究他的思想，继承他的精神财富，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作为中国近代杰出的无产阶级教育家，徐特立的著述是为时代立言的。他的教育思想，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因而他“并不是特殊的个人，而是一定时代的社会代

表”<sup>①</sup>，是中国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伟大变革时代的新思想、新教育的代表。这是国内外的共识。日本教育界翻译了他的17篇论文，收入《世界新教育运动选书》第六卷，把徐特立与蔡元培并列为近代中国新教育的代表，并称颂徐特立是“民族解放的斗士”。徐老的所有论著和教育实践及革命活动，反映了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革命思潮。他从崇信康梁转变到拥护孙中山，积极参加辛亥革命，曾被推选为湖南省临时议会副议长。由于痛恨军阀政客的腐败，又愤而辞职，主张“教育救国”。最后，他终于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并成为“八一”南昌起义革命委员会的成员。解放后，他曾重游南昌，写下了“而今重话南昌事，我是当年一老兵”的豪迈诗句。当人们翻开他各个历史时期的著述时，就会看到这位跨世纪的教育家，是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的战士，一位思想解放、振兴中华的先行者，一位时代的弄潮儿。他的一生，决不是跟着时代潮流随波逐浪，而是推着历史车轮前进。<sup>②</sup>

徐特立早在青年时代就开始了他的教育改革家的生涯。他曾弃蒙馆兴学校，倡导女子教育，是我国近代创办平民教育的先驱者之一。在“科学与民主”思潮的推动下，他曾东渡日本考察，西赴法国勤工俭学并考察西方教育。回国后，他力倡勤俭办学，民主治校，开学生参与学校管理之先河。在农民革命运动的激励下，他后来抛弃了“教育救国”的幻想，走上了“为革命办教育”的征途。徐老从1930年起，一直是我们党教育部门的主要领导人，先后担任过中央苏区教育部代部长、部长，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教育研究室主任，新中国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徐老曾在江西苏区和陕甘宁边区主持了我国近代教育史上规模空前的改革旧教育、创立新教育的实验，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以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



“江西红军在三四年中扫除文盲所取得的成绩，比中国农村任何其他地方几个世纪中所取得的成绩还要大。”在陕北，徐老面临的任務更艰巨，那里，“文盲几乎达人口95%左右”，斯诺认为，“要是西方的教育家，谁都会感到气馁的”，而徐老却信心十足，精神百倍，耕耘不止。在这期间，徐老对我国无产阶级教育事业的改革作出了重大贡献：首创农民运动师范教育和文盲师范教育；主持制定了近代中国无产阶级最早的教育方针、任务和一系列的教育政策及法规；亲自编写并主持编审了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教育的第一批教科书；制定了符合当时中国农村特点的“以民教民”的扫盲教育方案。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在我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延安自然科学学院任院长，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主持编审了新中国的第一批中、小学教材。他是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奠基人，杰出的教育改革家。

徐特立善于运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中国教育的实际问题。1942年，他在延安主持了我党历史上第一次教育方针大讨论，较深入地研究分析了我国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理论与实际的关系、目前与长远的关系、继承与创新的关系、通才与专才的关系、基础与专业的关系等中国近代教育的基本问题，在我国近代教育史上，首创教育、科研、经济“三位一体”的办学模式。他的把教育、科研与经济结合为一体的思想，对当前教育改革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1949年他又提出了“教育是社会的中心，也是生产的中心”的论断。当代发达国家的实践，有力地印证了“教育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有力杠杆”的观点。从40年代到50年代，他多次阐述了教育要中国化、科学化、民族化、大众化、社会化、多样化、地方化的思想，并进而把我国近代教育家们提出的“学生本位”的思想，推进到了“群众”本位的高度。50年代正当我国高等教育“全盘苏化”，掀起学习苏联的热潮之时，徐老却冷静地

指出：“就是苏联的经验也不能照搬。”同时，他还认为：“我们不但要学习苏联，而且要吸收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遗产。”这是很有真知灼见的。他十分重视道德教育，在《论国民公德》一文中，他倡导“五爱”，把“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作为新中国国民的公德。他强调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学校工作的第一位，主张“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与唯物史观贯彻到学校各科课程和实际生活的各方面去。”他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明了教育的产生、发展及其本质属性，构建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符合中国国情的教育理论与教学方法。此外，他在课程与教材的合理设置，引导大家如何掌握正确的教育理论与方法，如何创造性地培养人才，以及勤俭办学、民主治校、鼓励学术争鸣和建设良好学风、校风诸方面，均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徐老是一位七十三年如一日，为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教育思想和道路而奋斗终生的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

徐特立又是我国近代精神文明的伟大师表。他少年发奋，“十年破产读书”，自学成才，又作《书愤》、《言志》诗以明志。后舍家兴学，无私服务社会，并在国难当头“断指血书”，激励青年反帝爱国。他一生以书为伴，读书破万卷，藏书两万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一生勤奋育人，在半个多世纪的教育和革命生涯中，培育了几代人。在他早年的学生中，出现了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蔡畅、李维汉、田汉、肖三等一大批革命领袖人物和杰出斗士；在延安时期，他的学生中又成长出了一大批党和国家的建设人才，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解放后受他教育和影响的青少年就更多了。所以谢觉哉称颂他：“孔子不足高，墨翟差可比。”他七十寿辰时，远在国民党统治区上海的各界民主人士张澜、沈君儒、陈叔通、柳亚子、郭沫若、马叙伦、马寅初等 68 位社会名流签名，以“长松特立，民众之望”八个大字

的红色缎帐向他祝贺。毛泽东赞扬他“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周恩来赞誉他是“人民之光，我党之荣”；朱德直呼他为“当今一圣人”。所有这些崇高荣誉，他都是当之无愧的。

徐特立尊重科学，重视科学技术教育。早在半个世纪以前，正当抗日战争的困难时期，他就在延安《解放日报》著文指出：“科学的中心任务当然是经济建设。”当年他曾大声疾呼：“科学！你是国力的灵魂，同时也是生产发展的标志。”他在《再论我们怎样学习》一文中，曾深刻地指出：我们读了许多马列主义的书籍，可是有一句最主要的话没有读懂，即费尔巴哈论上说的：一切东西在辩证法面前没有神圣。<sup>①</sup>徐特立的这句话，今天对我们解放思想、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仍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总之，《徐特立文存》收入的所有文献和论著，其精神始终朝着一个方向，为了一个目标，那就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为革命和建设成功、为共产主义的实现。为了实现这个崇高理想，徐特立已奋斗了毕生，我们应该继承他的遗志，弘扬他的改革精神和师表风范，发展我国的现代化教育，实行教育兴国，科学兴国。

徐特立的论著及其教育思想，与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科学文化思想一样，渊源于过去，汇注于现在，奔腾于未来，必将愈来愈波澜壮阔，气势磅礴地推动我国教育事业和现代化建设大步前进。

---

①这是徐特立1940年在重庆《与戴伯韬谈陶行知教育学说的追述》中的一段话。戴伯韬曾奉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协助徐老工作。

②朱德同志给徐老六十寿辰的信中说：“不管革命历史车轮转的好快，你总是推着它前进的。”

③恩格斯的原话是：“在辩证法面前，确定的绝对的神圣的事物都不存在，只有形成和毁灭的历程。”见徐特立读书笔记《费尔巴哈论》。